

庆龙飞鸿

——严庆龙先生关涉编撰《敦煌学大辞典》 事宜的来函选录

柴剑虹

(中华书局, 北京 100071)

摘要: 上海辞书出版社原副社长严庆龙编审作为《敦煌学大辞典》副主编, 在该辞典编辑出版过程中给编委、作者写的数以百计的信件是敦煌学史的可贵资料。本文选录 1993-1999 年间严先生的 13 封信件内容并做了简要的说明, 表达对严先生逝世的深切悼念之情, 也寄托了对敦煌学界同仁在新时期做好修订、增补《敦煌学大辞典》工程的厚望。

关键词: 严庆龙 《敦煌学大辞典》 信函 修订工程

中图分类号: K87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0) 03-0143-13

己亥岁尾, 我们尊敬的出版界老前辈、编撰出版《敦煌学大辞典》的大功臣严庆龙先生驾鹤仙逝。深为痛悼并缅怀不已之际, 想起去岁初春时节, 我趁赴沪开会之便与李重申教授等到严先生寓所探望, 我告知曾建议国家图书馆敦煌学资料中心: 征集学界同道提供严先生关涉《敦煌学大辞典》编撰事宜的信函, 作为敦煌学史的一份资料(亦可为该辞典的修订提供可贵的借鉴), 承蒙严先生颌首认可。目前我已寻出严先生来函 20 余通, 兹选录其中 13 通内容如下, 亦可视作为示珠引玉之举吧(均简省了各函端尾之称谓、署名, 括注写信日期于后)。

(一)

我想向您报告一些情况, 讲的当然是有关《敦煌学词典》的事。

……正因为(贺银海编辑)的病在短时期内难以完全恢复健康, 所以他经手的词典的敦煌文学部分, 我就义不容辞地接收下来。现在, 我已仔细拜读完毕, 这里

收稿日期: 2020-03-10

作者简介: 柴剑虹(1944-), 男, 浙江杭州人。编审,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敦煌学研究。

把情况向您作一个简要的报告。

敦煌文学部分，先后收到两批稿子，根据我这次的统计，共290条。其中第二批的稿子都是孙其芳同志的。

这290条中，重复的有15条（如李正宇与孙其芳重复的，孙其芳自己先后写二稿而重复的，等等）；参见条也有15条，其中项楚（笔名海客）的有8条，他比较注意参见条的设置，其他诸位似不太注意建参见条，所以项楚以外的好几位作者，总共只有7个参见条。

此外，您批注拟删的有2条，拟重写的1条，拟转其他分支的2条。这290条的稿子质量，总的来看是相当不错的，其中，您和冬铃同志费了不少心血，或改写，或修改，随处可以看到您和冬铃同志的手迹，稿子之有这样的质量，您们起了主导作用，我一边拜读，一边心里时时在感谢您们。读到冬铃同志的手迹时，更有一种缅怀之情，他虽离世远去多年，但至今仍让我感到亲切、惋惜、感谢。

稿子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我们编辑部制订的体例的线条太粗，所以留下不少体例上的后遗症，例如北京图书馆的藏卷，在词条中就有多种表述样式：北图帝字78，北京盈36，北京图书馆藏周89卷，北京x字x号，北京潜字90，……；又如写卷，写本，敦煌写本，抄本，敦煌本……也是各写各的。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过去我们考虑不周，体例订得不够细致，这款情况，只要具体的规定弄出来，花些时间就可改好，而且可以主要交给我们来做。

上面所举的是简单的例子。当然也有比较麻烦一些的问题，例如李正宇、孙其芳的词条，分别地看，我觉得都不错，放在一起比较着看，一是各人有自己的格局，先写什么，后写什么，注重什么，不注重什么，他们两位写的是同一类型的词条，但格局各不相同，将来排在一起，势必不大协调，这就比较伤脑筋；二是李、孙两位有个别相互重复的词条，依我第三者来看，似乎可互相补充，合并成更丰富的一条，可惜，他们重复的词条“很少”（按理不该重复），所以能合并得更丰富的词条也就很少了，大量没有重复的词条，则是写成怎样就是怎样了。这里所说李、孙词条，只是举例。我边拜读，边把一些简要的情况与想法，有时或写个小纸片附在稿上，如果细讲起来，在一封信在不可能讲周全。我想在今年上半年到北京一次，届时将我们（包括其他编辑同志）对有关稿件的具体想法与对口的作者交换意见。敦煌文学这一部分，我也想这样做。因为此稿的基础相当好，所以这290条稿子，在我们交换意见之后，请您花的时间大约是不会多的（或者说是很少的），经过这一番处理后，我想可以发稿了。

现在我比较着急的是，敦煌文学的稿子还没有齐，您那里是否收集齐了？数量多少？能否在近期内将稿子寄来？作为一名编辑，总盼望经手的稿子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是丰富的、上乘的，我期待着您即将寄我的稿子有相当的数量，有相当的质量。……但《词典》已拖了多年，若再不抓紧催稿、改稿与发稿，更觉无法向

朋友们交代，这次是真正地“动真格”，务期抓好这项工作，还请您大力协助与配合，日后当再面谢。

(1993. 4. 1)

信中提及的贺银海同志是上海辞书出版社担任《敦煌学大辞典》文学类词条的责任编辑，工作认真、细致，亦为编辑辞典事宜常与我联系，后因患脊髓血管畸形导致左腿瘫痪，1989年6月至1991年两次住院治疗，出院后仍坚持工作；1993年初又因患脑瘤住院治疗，仍念念不忘辞典的编辑工作，后不幸于1995年11月下旬逝世。盛冬铃同志是我的挚友，上海人，北京大学裘锡圭教授文革后指导的第一届语言学研究生，1981年与我同时进中华书局工作，曾担任中华书局语言编辑室主任、总编辑助理，我邀请他担任《敦煌学大辞典》语言类词条编委，1988年曾邀他一道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小住一周，做编辑该辞典的资料准备工作，1991年6月因肾病不幸逝世。

(二)

大礼拜悉。感谢您对词典的支持。

本月下旬，我将进京参加《佛教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座谈会，会期为27-28日，我拟于26日抵京，兼做敦煌学词典的事，故定于30日返沪，留出29日一天及26日的部分时间，与词典的有关作者联系。我想在京期间争取去拜访您，将已拜读的二百余条稿子的情况，向您当面汇报与交流意见。我知道，那时您正值准备到国外出访的时间，可能连一分钟也抽不出时间来，那就请勿勉强，也可以以后再联系。不过，我到京后，总要设法同您电话或当面交谈几句。

我参加这个会议，大约起一点咨询或“顾问”之类的作用，并非又投入另一部大辞典的工作，于我们的敦煌学词典，在时间上不会有什么影响。……

(1993. 4. 14)

严先生此番进京参加《佛教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座谈会，系该辞典主编任继愈先生亲自“点将”邀请。任先生是我们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首届理事会的顾问，对《敦煌学大辞典》的编撰工作亦十分支持。严先生这次在京抽出宝贵时间与包括我在内的《敦煌学大辞典》几位编委进行了必要的交流。

(三)

日前收到来信，谢谢。

《词典》说起来是为敦煌学作贡献，但落实到各位编委和作者，实际上都是“友情”参加，像《编辑部故事》电视剧中那些名演员参加友情演出一样，讲友情，讲贡献，不讲回报。……

读了您的信，您忙这忙那，都是重要的事，读到您还要献血，还想在献血休息期间弄词条，我心里既感动又难过，同志，您实在太辛苦了，无论如何，保重身体第一条，词典的事，大不了再推迟二个月，绝不能因赶词典而损害作者的健康。

当然，话也要说回来，词典到了最后合拢的时候，还是希望集中全部稿子，及时定稿、发稿。昨天与沙知先生通了一次长途电话，大约您的稿子在十月定稿期间交稿，我想时间上是来得及的。我和陈炳同志已定于下月六日离沪，七日抵京，准备在京逗留二十天左右，与众位编委、作者共同讨论定稿问题，届时有关敦煌文学的稿子，自将当面请教与商讨。

(1993.9.14)

“为敦煌学作贡献”，这是《敦煌学大辞典》编撰期间严先生常讲的真心话。他担任辞典副主编，通过多年的编稿实践，大家都认为他不但已经跨入了敦煌学研究者的行列，而且贡献非凡，但他却不同意在辞典的人物部分为自己列条介绍，即实践他信中强调的“讲友情，讲贡献，不讲回报”的诺言。但他却处处关心我们这些后进者（今日可戏称“后浪”吧）。因为当时书局每年有“义务献血”的“指标”，1993年分配到我所负责的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作为编辑部负责人，我恰好又刚在献血者年龄上限50岁之内，就报名献了一回血。严先生得知后，尽管当时正处于交稿的关键节点，仍写信关照我“保重身体第一条”，今日读来，依然感念不已。10月上旬严先生来京，宁可副主编召集举行了研讨辞典定稿的工作会议，有效地推动了辞典编撰进程。

(四)

手示已拜读，祝贺您初步通过正编审！……《词典》的人物词条中，只要是1994年底以前“算起”的，均补上正高一笔，赵和平、郝春文等六人，和平同志已正式来信通知，均补了正高的内容。……

[俗讲仪式]条，遵嘱补了张鸿勳的名字，这一条就是您与张共同署名了。

韩国的敦煌学著作，我的印象中，似没有收为词条（我没有仔细查阅著作词条），这件事是荣新江同志负责的，也许我们在这方面与韩国交流刚刚开始，所以对他们的状况可能了解不多，您如方便，能否将您在韩国所见的敦煌学著作与新江同志通通气，要不要补收一、二个词条等等，当由荣来决定。

“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即将成立，是大好事，这个机构，应该写一个词条，但是《词典》的下限时间定在1994年底，因此1995年以后的情况就不可能反映在词典里了。谈到这个基金会，记得您说过，您是副会长，一定能起不小的作用。我们这部词典，虽然出版社表示要出版，并已列入今年的出版计划，但他们一点也不着急，从来不催我，偶尔交谈到这部词典时，他们老是说要赔钱等等。似乎有一种“鸡肋”的感觉，……所以，在基金会成立之后，恕我姑妄言之，能否

为词典争取一点“赞助”（赞助者的名称当然应该在词典的某处出现）？所谓“赞助”“资助”，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不是社里授意的……我的想法，不过是对老熟人随便说说的，并非“非要如此”之类，您在基金会上有相当发言权，但毕竟是集体的事，此事能提到会上，当然好，不提或以后视具体情况慢慢提，均可，绝对不要勉强，我这里也不过是“试探”而已。

(1995. 3. 9)

信中提及“俗讲仪式”词条共同署名事，后经征询张鸿勋先生意见，决定另外单列由鸿勋撰写的“俗讲”一条，不仅内容可更充实，也与他撰写的“法师”“都讲”“俗讲僧”等词条搭配。

此信和下一封信中均提及为《敦煌学大辞典》争取资金资助事，因为鉴于出版环境中的若干不确定因素，所以严先生提前提出十分必要；其时，“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已经中国银行批准，即将正式成立，确定理事会成员以敦煌研究院学者为主，由李铁映副总理任名誉理事长，段文杰院长担任理事长，考虑到全国性的民间社团组织机构设在北京为宜，所以在所聘院外理事中要我和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担任副理事长（后于1995年11月3日颁发聘书）。从扶持年轻学者出发，基金会成立不久，段理事长就批准给院里几个年轻学者出书资助；于是我也给段理事长写信提出资助《敦煌学大辞典》出版的申请，段先生复信不同意，理由是“内外有别”（即只能资助院内人员），我感觉不好理解，即写信说明不仅研究院参加该辞典编撰的学者有二十几位，段先生本人还是副主编，怎么就成了“外”呢？为了不辜负严先生对顺利出版辞典的期盼，我又请同时担任副理事长的施萍婷和荣新江二位，联合署名提出申请资助《敦煌学大辞典》出版费，最终获得批准。1998年12月该辞典正式出版时，在版权页上署明了“本书由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资助出版”。

(五)

向您报告一个消息，《词典》的整理工作，正文部分已全部结束，日前，我已将正文的稿子移交给现任总编辑鲍克怡，因为图版的制作，据江小铎同志说，尚须二个月左右，所以此次将稿件交鲍，还谈不上是正式发稿，但至少我的编辑任务是基本完成了。交鲍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抽时间稍为翻一翻，可以有一个具体印象，将来也可以有一个说法。至于正式的发稿，能争取在六月底之前做到，恐怕已是不错了。

随函附上全书的明细统计表一份，这算是比较“微观”一些的情况了。分类与标题，多数是李永宁、宁可、郝春文等几位分别商定的，我在整理时，又掺入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最后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的想法是，分类既不宜过于琐细，又不宜概括得太“原则”，标题若做得太很概括，将许多类的东西一股脑儿拢在一

起，读者可能不明白其中是些什么；所以，去年十月间我与宁、郝在北京商定的分类与标题，这次我在此基础上又稍稍弄得“细”一些，例如原来的“语言·文学”这一类，包括书法、印章，现在索性拆成“语言·敦煌文学”与“书法·印章”两类。这些分类与标题，合适与否，请您协助全面审定一下，个别的确需要调整的，在正式发稿时仍可调整。

这部词典，在今年初，听说已列入本社的发稿计划，巢峰社长在一次会议上还提到这本书。本来，我以为这下子定可顺顺当地出版了。不过，前不久鲍克怡对我说，她是始终支持此书出版的，而巢则有一次表示如无资助，碍难出版云云。……当然，主要还是力争由我社出版，而如能弄到一些资助，则我社出版的可能性更能敲定了。基金会有没有资助的可能性，仍望您惠予关怀与联络，您那里基金会资助的这条路，我仍寄于较大的希望，如果这条路走通了，鲍和我可以很“硬”得起来了！……

稿子“发”出，稍稍舒了一口气，后面还有附录之类的事，尚未解决，将来还有看校样，等等，事情还有不少。这几年我差不多全部时间都投在这部词典里，做的虽属“作嫁衣”的琐事，但也感到有点“吃力”，至于作者，每个词条呕心沥血地撰写，其辛苦我是深知的，敦煌文学部分，在您多年辛勤劳动下，最终达到600条左右，成绩十分可观，作为编辑，应该向您致谢、致敬，谢谢您的合作。

(1995.4.24)

[后附：《敦煌学词典编排说明》及《敦煌学词典分类统计》共4页]

据悉，该辞典的“编排说明”及正式出版时的“凡例”，均由严先生亲自拟稿后征求编委意见修订、酌定，最后选收60余个门类的6925个词条及彩图123幅、随文插图626幅，后有10个附录、2种索引和“莫高窟石窟位置图”，均凝聚了严庆龙先生的大量心血。

(六)

寄来关于敦煌吐鲁番出版物研讨会的征询函已收到，谢谢。

我基本是准备参加这次活动，除非有什么意外的事不能成行。……筹备一次成功的会议，很不容易，您为这次会议，大约要很操劳了。

最近，我将《辞典》的一些“配件”陆续整理或草拟了出来，关于编委会与撰稿人名单，也整理出来了，现随函寄呈一份，请您审核过目。这件事最怕漏了名字或写错名字，所以请几位熟悉的编委一起把把关。

关于上名字，有几点说明：一，已经逝世的编委，有的同志主张不必加黑框，这里所以没有加；二，朱雷先生最后没有交出他写的稿子，我问宁先生怎么办？去年十月，我在北京，正逢唐长孺先生辞世，鉴于此情况，宁先生当即向我表示，朱

先生应保留。此事，今年我在与陈国灿先生一次通信中，顺便通报了宁先生的意见，陈表示感谢，并说朱先生当初曾参加过多次稿件的讨论。三，撰稿人的列名，要不要规定至少撰写若干条以上才能上名字，宁、季两位认为凡撰稿者，无论写几条，均上，故如陈炳同志，受赵和平的委托，整理与撰写了“谢稚柳”一条，也列名。

关于这张名单，无论有问题，或无问题，均盼在审阅后赐复，这样，我好改，或可以放心。

(1995. 5. 24)

[后附《敦煌学辞典》编辑委员会名单。开列主编季羨林；副主编唐长孺、段文杰、宁可、沙知、严庆龙；编辑委员白化文、史苇湘、樊锦诗等 31 人；撰稿人万庚育、王克芬、周绍良、孟列夫等 107 人]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决定于 1995 年夏天在新疆吐鲁番及库车地区举行“敦煌学出版物研讨会”，由我和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共同筹备。我们决定邀请国内敦煌吐鲁番学者及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上海辞书等几家出版社负责人参会。严先生收到征询函后非常高兴，迅即取得了上海辞书社领导的同意。在吐鲁番的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凌晨 6 点（天色为内地 4 点）分乘大巴、中巴从吐鲁番出发，其时尚无高速公路，颠簸 18 个小时，于午夜 12 时到达克孜尔的龟兹石窟研究所。严庆龙先生毫无倦意，十分兴奋，让我们这些同行的年轻人钦佩不已。

《敦煌学大辞典》正式出版时，主编、副主编名单未变；编委列名 32 人，增加了辞书社老编审谈宗英先生；作者列名 121 人，增加了 14 人。

(七)

刚才放下长途电话的听筒，关于“中心”（柴按：北京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要敦煌学者的资料事，突然想到另一个情况。我们的人物词条，事先都制表请有关对象填写，然后由赵和平根据各人所填写的材料，结合《辞典》的要求，整理成词条，由于词条有一些体例规格等的要求，所以不可能将各人自己填写的材料全部写入，例如，关于论文和著作，规定论文只选三篇（不可能一二十篇或更多的论文全部照录），著作也只选三种左右，至于非敦煌学的著作，一般不写入词条（或只是一笔带过）；关于履历，学历只写大学毕业以上的，工作只写高校、研究机构及出版社等，其他如参过军、在某中学任过教员等，均略而不录。因此，词条所反映的并不是完整的全貌；相反，那个由本人填写的表，倒是“原汁原汤”。我不知道“中心”需要的属于哪一种类型，若是希望更“原汁原汤”一些，其实和平同志那里的资料也许更适合一些。这些个人填写的表格，一般来说，最后宜由某个团体、机构保存较合适。不过，这件事要与和平商量，目前，如“借”出来复印一下，

按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当然，如果“中心”仍认为用《辞典》的词条为好，我仍可以办。还有，《辞典》中的外国人物、港台人物等，一般似无“表格”，这些人，我应该提供复印件。

估计这件事不是非常急，所以马上写信补充上述的情况和意见，供您考虑选择。若和平同志那里的材料。则中国人物词条就不复印了，只复印外国与港台的。若不考虑和平那里的材料，也请来示，我就全部复印寄呈。

(1995. 10. 10 晚)

“敦煌吐鲁番学北京资料中心”于1988年8月由北京图书馆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共同建成，成立初期，曾发函请相关专家学者提供本人简历及著述等资料，但响应者不多，于是该中心想趁编撰《敦煌学大辞典》之机，请辞书社提供敦煌学者简历。因赵和平教授是负责该辞典人物词条的编委，故后来请他按严先生的意见具体办理此事。

(八)

来信及两个词条均拜读。两个词条很好，我想就这样可以了。若是再苛求一点的话，或者冬铃同志这个词条里能否再补上一句“撰有xxxxx（指某一类的，如语言文字方面，文史方面……）论文xx篇”之类的话，这是我主观的想法，因为目前这个词条，虽还可以，但毕竟比较单薄，……我这个说法是姑妄言之，仅供参考，请勿勉强，不加也是可以的，单薄一些也就只好如此了。

您要我整理的发言稿已完成，本来可以早些寄去的，因前几天有比较急的事插进来，耽搁了几天，很抱歉。我不知道此稿用于何处，内部用用大约可以，不宜公开发表。如是刊印，或请寄我一份。如不合适，务请勿用。现将此稿随信寄呈，请查收。

前几天，与美编小江电话联系，他表示争取本月内将图版都弄好，若真能这样，已经很感谢他了，下个月真的可以发稿了，但愿他能实践他的允诺。

(1995. 10. 20)

根据严先生意见，已英年早逝的编委盛冬铃虽非敦煌学研究者，也应该在辞典人物部分列一词条，该词条嘱我代为撰写。鉴于盛兄一贯低调，之前并未告知已发表的著述，故这方面内容阙如，严先生则希望加以补充。信中所讲另一词条似是俄罗斯敦煌学家孟列夫词条，当时请他的女儿娜希嘉撰写后寄来，由我在文字上做了梳理后寄呈严先生。

信中所述要严先生“整理的发言稿”，是指他在“敦煌学出版物研讨会”上的发言，请他提供一个整理稿，准备刊登在相关的内部通讯上。

(九)

今日收到挂号信，谢谢您很快示复。

信中所述诸问题与复印稿上的批注，均有道理，谢谢您的指教，我已全部按您所说诸点作了处理，有的则不去考虑更动了。

关于对辞典之资助，您是热心者，信中说有希望，这是好事，我想暂时不同社里讲，以后视适当时机再说，我的想法首先应立足于社里自己解决问题，然后若有资助，则会喜出望外。谢谢您和其他几位基金会中的作者。

辞典的发稿时间，我今日又与美编小江作了联系，他表示下月十日前可以将插图工作全部完成，这样，再加若干天，年内发稿应无问题。“过年”是个关，估计大家都不大会还想拖过这个关吧。

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贺银海同志因病已于前几天逝世，二十三日开了追悼会。银海同志是很好的同志，工作很积极，业务上进步也很快，能独挡一面，近些年来一直患病，脑子开过刀，这次是脑病而去世的。……我与银海同志多年合作，相互配合得很好，他的逝世，我是很悲伤的。

照片已收到，是很好的纪念，谢谢。

(1995. 11. 27)

到1995年秋天，《敦煌学大辞典》的文字编辑工作已经完成，严先生的主要关注点即转为美编的插图工作，以及落实基金会的出版资助，希望年底前能正式顺利发稿，以期第二年年中能排出初校样。事后证明他的期盼促进了出版进程。又，我们得悉贺银海编辑英年早逝的噩耗，均十分悲痛，记得还专门致函辞书出版社表达了悼慰之意。信中提到的照片，是我在新疆天池畔为有严先生在内的参会代表拍摄的合影。

(十)

宁可、沙知、剑虹、春文诸先生：

各位好！

去年底《辞典》发稿后，就疏于联系了，这也许是比较自然的事。不过，《辞典》从发稿到出版，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保持一些联系还是必须的。

所谓“发稿”，是从编辑部门“发”到出版部门（我社称“出版科”），出版科按照收到稿件的先后与轻重缓急，逐一处理已发稿的稿件。我们这部《辞典》在本月内已轮到了，今天，我与出版部门的同志作了一次纯业务性的交谈与讨论。参加者还有谈宗英、杨蓉蓉。

关于版式，分两栏等等，这里就不具体报告了，总之，出版部门已大体上理解了这部辞典的价值，表示一种配合的姿态，愿意共同做好这件工作。

有些事情是需要向诸位先生报告或通气的：

一、有的同志认为既然此书颇有价值，而且规模在200万字左右，不算小，建议将书名改为《敦煌学大辞典》，即加一个“大”字；有的同志对此表示了相当的

热情，并举例说明称“大”并不过分，等等。我本来对此并不计较，也没有主动提出要“大”的想法，现在既然有些同志积极建议，我就将此情况向各位报告。在出版社内，基本上是一部分积极主张加“大”，一部分表示加也可，不加也无所谓，但没有人反对加“大”的。最后加不加，想请诸位拿个主意，并将决定的意见赐复。

二、关于封面（包括扉页等）上的书名，用美术字抑请学者、书法家题签，过去在没发稿前，不急于提此问题，现在似可以考虑了，比较主要的意见是，想请剑虹同志转请启功先生题写，这个想法，不知诸位的意见如何？例如，启功先生的健康状况好不好，能不能写？或者，拟请另外某一位先生题写等等。总之，我们几位编辑初步提出了这个想法，最后如何落实，或另作考虑，等等，请诸位决定。

三、据出版科同志告知，如果他们在三月底前能发到照排公司（此书拟用照相排版），则七月间可能拿到初校样（200万字的全部校样），这是初步的说法，照排公司也要“排队”，真正“上手”，也许速度不慢。上述的初校样，当属毛样，还需要初次校对，轮到校对这一环，当然同样也要“排队”，并非校对科空着专等我们这部辞典稿的。这个初次校对过的东西，何时可到我的手里，还很难说，而未经初校过的校样，看起来是很吃力的，不行的。我这里先报告一下，一是希望各位知道今年第三、四季度可能还有看校样这件事，二是目前看来，付排与出初校样的过程，也许会是正常的。

四、校样出来后，我想将稿子分别寄给有关作者再看一遍，并不是要大家再修改一遍，这是绝对不行的，主要是看看有没有硬伤的、知识性错误之类的问题，这项分别寄收与可能的改动（应该是小改动）的工作，大约是相当“烦”的，不过总得做下去，前后恐怕得花几个月时间。同时，我们（包括谈、杨等）还非常希望有一、二位编委能对全部稿件翻阅一下。去年新疆开会时，我曾同春文同志谈起此事，希望春文同志能承担此项任务，如可能，请春文同志到上海来小住若干天，集中时间来翻一翻，专家的视角与编辑眼光互不相同，我们编辑当然应该把关，再有专家把关，大家可能更踏实些。春文同志之外，若另有合适的先生参加若干天的翻阅工作，当然也是好的。这件事不是马上要定下来，不过，我想早一点吹一下风较好。若有其他有助于保证质量的方法，更盼赐教。

这封信，也可写成三封，一寄宁、郝两位，一寄沙，一寄柴，恕我简单化，三合为一，有劳春文同志张罗联系了。

信中所述诸情况，要不要向主编季先生报告，悉听诸位处置，我均无意见。

（1996.3.5）

此信是《敦煌学大辞典》正式发稿后，严先生就书名、题签、审读校样等重要问题，写给宁、沙、郝和我四个人的，春文请示宁、沙二位副主编后，交由我具体处理。书名加一“大”字，大家均表赞成。请启功先生题写辞典名的任务交给了我。启功先生考虑因是敦煌学的专业大辞典，就采用了繁体竖写，写的那天精神矍铄，挥笔而就。

后来出版社决定该辞典简体横排，考虑到出版规范及封面设计的要求，就将启功先生的题签单印在扉页上了，效果也挺好。启功先生不但是《敦煌变文集》的六位编者之一，而且也算不少敦煌写本残卷的收藏者和研究者，“《敦煌变文集》”词条由我和刘方女史合写，但不知什么原因，辞典的人物部分却缺收了“启功”词条，不免遗憾。对于审读校样这个重要环节，严先生信中叙述得十分周到和专业，他希望将具体的组织工作请春文来做，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十一)

樊锦诗院长要的材料，请社里出版科同志与排版公司打交道，提前排出来，并由我自己校对后，已经于今日寄北京，谨此报告。

本来，八十个词条，字数不多，弄起来快得很，但因同外面打交道，又是打乱人家的工作顺序，所以费了一些时间。不过，大家总算还能配合，弄出来就好。

校样已排出并经初步校对（排版公司的校对，不是本社的校对。据说本社的校对要另行“排队”，可能较迟），有四百页，过两天，他们将把这些校样托人带给我。据说，在七月底全部排毕，已不成问题。以后我又要忙起来。目前，我手边为友人审的一部稿子，要到七月底才能审毕。社里则先后两次找我，希望我帮助审些稿，一部是五百余万字，我婉拒了，审这样的稿子，至少半年，我就没有时间做《敦》的事了；另一部是七八十万字的稿，我也基本上回绝了，他们实在找不到人时，我仅答应分审其中的一部分，花一、二个月应付之，如多花时间，势必影响《敦》的工作。

顺便问一下，等文学部分的校样出来后，也需要请各有关作者自己再看一遍。看这些稿子，有几种办法，一是全部由您最后审阅，不再分别请各有关作者复阅了，如您认为某个词条需与作者商量的，由您与他们联系。这样做，比较集中一些，统一一些，但您就辛苦了。二是分别由各位作者看过，然后集中到您那里作最后的审定后交我。三是由我与各位作者打交道，由我寄给他们，他们审完寄给我。我如觉得有需要商榷的与他们再联系，或向您报告或请教。若是第二或第三种，则需请您提供作者的通讯地址等。上述三种办法，我都可以，若问我的倾向性，当然倾向于第一种办法，因为我可偷懒一些了。但无论何种办法，都是我份内应做之事，所以都是可以的。

(1996. 6. 21)

《辞典》排版过程中，樊锦诗院长因工作需要，提出希望出版社能提供由她和院里其他研究人员撰写词条中的八十多个词条的排样，具体要哪些词条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据我约略统计，樊院长本人为《辞典》里石窟考古、石窟艺术撰写的词条，有将近150条）。因为是临时要求，严先生马上协调排版公司提前插排，完成了院里的任

务。严先生在信中明确告知，为了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保证辞典校样的审读工作，他回绝了辞书社要他审读其他书稿的请求。同时，他也就敦煌文学类词条校样的审读办法，向我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后来我是以第一种办法为主，个别拿不定主意如何核定的，则征询词条作者意见后请严先生最后审定。我收到此信后不久，严先生又寄来了一份由他拟订的“《敦煌学大辞典》初样审阅注意事项”油印稿，共14条，文字简洁，每一条都凝结着一位资深编审丰富的工作经验，其核心要点体现为第8条末尾的八个字：“保证质量，高于一切。”这也是他在编撰工作中一再强调的，对作者和编委审阅校样提出了规范要求，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十二)

根据刚才长途电话所述的需要，特寄呈“《敦煌学大辞典》发稿情况简报”一份，供参考。

基本情况就是这些，没有大变化，至于正文词条数之6908条，经过此次校读初样，略有变化，有增有删，总数不会少于此数，略有增加，可能在六千九百十余条至六千九百二十余条之间。

谢谢您对《辞典》的一贯的关心。

我现在工作的重点已转到审读《辞海》稿，但《敦煌学大辞典》的事，有需要的，仍放下手中其他事，先办。

(1997.4.2)

经过作者、编委会和出版社责编及校对人员的初校审读，到1997年一季度末，《敦煌学大辞典》初校样即将退厂核改，严先生的相关工作基本完成，寄来了一份“《敦煌学大辞典》发稿情况简报”；他作为该大型辞书1979、1989年版均参与编辑工作的老编审，又应聘承担了该辞书的编委，转入审读1989年版《辞海》的增补修订稿，因为确定《辞海》1999年版要“在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如期间世”，任务之繁重可想而知。即便如此，严先生仍继续关注《敦煌学大辞典》的出版进程，信中“先办”二字，表明了他的信义，令人感念。

(十三)

今天再次相聚，十分高兴。只是分手时稍为匆促一些。

现在想起，今天的谈话中，对《辞典》似基本上没有提起什么。其实，《辞典》的插图费至今尚未发寄，还在等社里批下来。我直接催过李伟国、鲍克怡，对美编更不知催过多少次，今晚又打了电话。文字稿费在三月间已汇出了，插图稿费没有理由拖上一二个月，但的确尚未批下来！此事我今天忘记讲了，故补此信，

我会再三地催他们，估计解决的时间不应很长了。……

我为《辞典》做了一些事，这是我份内的工作，学会诸先生给我勉励，赠我纪念物，对照我工作上存在的错误与不足，深感受之有愧。有些事，只能等他日《辞典》再印时，争取作个别的改进与改正了，届时并望您和有关作者继续给以指教和支持。……

今后您如路过上海或直接来上海办事，仍盼与我联系，希望能再次相聚，编《辞典》而能结识像您这样的几位朋友，真是有缘，是一大收获。

(1999.5.18晚)

《敦煌学大辞典》于1998年底顺利出版，严先生不但仍为催发图版稿酬而操心，而且颇为前瞻地提出了重印改进的问题，也表达了通过编撰该辞典与敦煌学界朋友结缘的喜悦真情。《敦煌学大辞典》问世后，得到学界、出版界认可，于1999年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上海《文汇报》1999年2月23日刊登邢晓芳的专题报道中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中国第一部关于敦煌学的大型工具书出版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重视。据出版社人士介绍，《敦煌学大辞典》今年1月甫一问世，法国、日本等有关机构、学者纷纷前来订购，仅上海图书进出口公司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就向海外销出了近200部，销售业绩令人惊喜。”

二十年过去了，修订、增补《敦煌学大辞典》的工作提上日程，我高兴地获悉，2019年2月17日，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主办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编纂工作会议在该社图书馆举行，成立了以郝春文教授为主编、赵声良等六人为副主编的编委会，标志着这项新工程正式启动。严先生应邀莅临会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3月13日，我利用到上海体院开会的机会，到严先生家中探望。严先生坚持依“边吃边谈”的惯例请我们到一家餐厅共享特色午餐，餐间话题自然谈及《敦煌学大辞典》，除了认可征集他的相关信函的建议外，这位年届九十的老前辈对该编纂工作的“后浪推前浪”寄予了极大期望。岂料这竟是我们和严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和聚餐！今年初，惊悉严先生于1月4日在家中仙逝的噩耗后，我在悲痛之中，吟出一首小诗以寄托我的缅怀之情：“庆龙先生是严师，卅载教诲铭心底。笑谈‘四部’重传承，戏称‘三老’忆往昔。飞鸿数百主姓‘敦’，大典一部凝精气。今朝白雪祭忠魂，功名卓著留青史。”自注云：1. 严先生系新中国建立前上海大学生，共产党地下党干部，1957年被错误打成“右派”，后从事编辑工作，故他曾自嘲为“三老编辑”。2. 在《敦煌学大辞典》编辑工作中，严先生一直强调该辞典的条目“都姓‘敦’”，以突出这部辞典的专业特色。严先生为此辞典编撰写给编委、作者的信有数百封之多，亦皆“姓‘敦’”也！严先生的千秋功勋，学界自有公论，历史已经定评。

严庆龙先生安息！